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郭沫若

梁满仓 编写 新华出版社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 问：王首道 康克清

主 编：苏双碧

副 主 编：陈君聪

编 委：李 捷 曹宏遂

周道荣 宋镇铃

马宝珠

责任编辑：郑丽敏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郭 沫 若

梁满仓 编写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售

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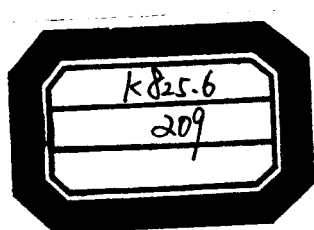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625印

1990年9月第一版 1990年9月北

印数：1—15,000册

ISBN 7-5011-0795-5/K·113

定价：1.10元





2 032 1351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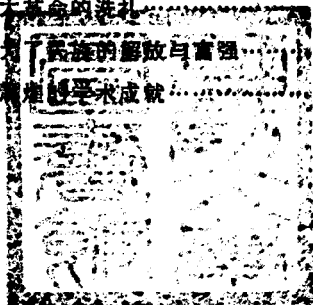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郭沫若

梁满仓 编写

目 录

一、自然家庭社会.....	1
二、异国十年.....	7
三、世界观的初步转变.....	15
四、大革命洗礼.....	22
五、为了民族的解放与富强.....	31
六、辉煌的战斗成就.....	41



一、自然家庭社会

1892年11月16日，我国现代杰出的文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郭沫若，诞生在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被誉为中国四大名山之一的峨眉山，耸立在它的西面。大自然犹如一位杰出的化妆师，使这座秀甲天下的名山时时更换着衣装和容态。郭沫若的童年，就是在这样一个如诗如画的环境里度过的。

故乡优美的自然风光，启迪了他幼小的心灵，激发了他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他后来之所以那样倾心自然，写下了许多赞美大自然的诗篇，甚至他那阔大的胸襟和雄浑豪放的诗风，都与他童年生活的优美环境分不开。

郭沫若本名开贞，号尚武，沫若是他后来到日本留学时，因有人误把他称作“开贞女士”而改的。这个名字来源于他故乡的两条河，沫水（即大渡河）、若水（即雅河），这也反应出他对故乡山水的钟爱。

郭沫若家原籍是福建省宁化县，先辈于清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迁入沙湾。初入蜀时，家境十分贫寒，到了他曾祖父郭贤琳一代，才开始发迹。到其祖父郭明德时，家道又一度衰落。郭沫若的父亲郭朝沛，15岁经商，精明干练，颇懂经商之道，又使家业重振起来，成为当地比较富有的地主兼工商业家庭。

母亲杜福荪，是一个零落的官宦人家的女儿。她的父亲

杜琢章，是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的进士，任过贵州龙泉、广顺、修文等县的县官。1857年在他任黄平州州官时，因苗民起义，城陷身死。

母亲虽出身官宦之家，但由于家庭败落，很少有名门闺秀的娇贵。她15岁嫁到郭家，不仅亲手抚养子女，而且还和妯娌轮流料理家务。她虽自幼失去父母，没上过学，但资质聪明，通过自学识字，会背很多首唐诗。郭沫若在很小的时候，便被母亲领入诗的世界，尽管当时他还不完全了解这个世界，但它那朗朗上口的韵律和抑扬顿挫的节奏，却吸引着他，并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诗的种子。

1897年的春天，未满五岁的郭沫若被送进一家私塾读书。入学读书在幼小的郭沫若看来未尝不是一件乐事。他自幼聪明，记忆力强。还未上学时，看见已经上学的兄长们朗读《易经》、《书经》，他听几遍便能背诵。因此当父亲把他带进私塾，向孔子牌位和私塾先生磕头时，他还非常高兴。

但是不久，旧式的私塾教育与活泼好动的童心发生了冲突。入学没过三天，郭沫若便逃起学来，接着便被父亲用强制的办法抱回学堂。最使郭沫若不能忍受的是，先生打人。郭沫若入学不久，小脑袋便被打得尽是疤。母亲见他可怜，替他找了一顶硬壳帽，以去除头部挨打时的痛苦。不料由于二兄和他争抢帽子，秘密很快被先生发现。以后挨打，总要被先生摘掉帽子。对这种用棍棒逼学生读书的教育方式，郭沫若曾进行过多次诅咒。这也初步形成了他的反抗性格。

郭沫若在私塾中诵读圣贤书的年代，也是中国社会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时代。

1898年即他入学的第二年，发生了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1900年，中国大地上又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这两次运动虽然都失败了，但却传播了民主、自由的新思想，进一步动摇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

清王朝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政权，从1901至1905年间，以推行“新政”为名，陆续实行了一些“改革”。在文化教育方面，废八股、废科举、兴学校、派留学生等措施便是在此期间采取的。这种风气也使郭沫若所在的私塾教育发生变革，除圣贤书外，又增加一些新的自然科学和外国历史知识。郭沫若最初读到的是《地球韵言》和《史鉴节要》。稍后，私塾又以上海出版的蒙学教科书为课本，内容包括格致、地理、地质、东西洋史、修身、国文等课程。私塾先生不仅不再殴打学生，而且还积极向学生传授新知识。在读古书方面，安排也比以前科学。一面读《左氏春秋》，一面读《东莱博议》，两本书文字都比较好懂，而且能给郭沫若以很大的启发。

这时，在成都东文学堂就读的大哥郭开文，已成为热心变法的新派人物。为了推动私塾的改革，他利用在成都上学之便，将那时能够买到的新学书刊，源源不断地寄回家去。这样使郭沫若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新思想、新知识。郭沫若此期间读到的新学书刊有北京出版的《启蒙画报》、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浙江籍留日学生办的《浙江潮》，以及讴歌变俗人作的《经国美谈新戏》等。尤其是《启蒙画报》，文字浅显，图

文并茂，深受郭沫若的喜爱。这些新书或提倡儿童教育，传播新的知识；或宣传民族革命；或揭露社会黑暗，不仅开拓了他的视野，而且使他开始接受民主、自由和富国强兵的思想，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热情。在这方面，大哥对他的影响起了重要作用。此外，他大哥喜欢诗画和书法、篆刻，这对郭沫若的书法兴趣的产生也有重要影响。正如后来他自己所说：除父母和沈先生（即他的私塾先生沈焕章——笔者）之外，大哥是影响我最深的一个。

郭沫若在私塾里读书九年，这九年对他的一生至关重要。这期间，他把古代经书《诗经》、《书经》、《易经》、《周礼》、《仪礼》、《春秋》等全部熟读并背诵下来，为他后来从事古代历史和古文字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由于私塾教育的革新，他还阅读了著名古典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的残本，偷偷地读过王实甫的优秀杂剧《西厢记》，叙述西湖名胜和人物传说的《西湖佳话》，以及描写才子佳人的长篇《花月痕》。正是这些不同风格，不同价值的文学作品培养了他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他后来在文学创作方面的辉煌成就，与这9年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1905年9、10月间，郭沫若由父亲带领，报考乐山县高等小学。小学设在嘉定城内，离沙湾75里。那时科举虽被废除，但在人们的观念中，小学毕业生与旧时秀才等同。所以在应考的一二千人中有不少人已年过30岁。经过初试和复试后，郭沫若在所取90名学生中名列第11，成为乐山县第一批高小生。

1906年春，小学正式开学。这虽然是废除旧学后的新式学校，但在许多方面仍存在着旧学的痕迹。并且几位老师对旧学都比较熟悉，对新学则知道甚少，而郭沫若投考新式小学，是为了学习新的科学知识，这样他的求知欲望没有得到满足。

1907年6月5日，郭沫若结束了一年半畸形的小学生活，提前高小毕业。同年秋升入嘉定府中学。这所新开办的中学也和小学一样，学生年龄大小悬殊，程度各异。教员由各县平均摊派，师资水平不高。郭沫若对这种学习环境很不满意，他认为在这种环境中没有前途。他想走，想远走到北京、上海、成都，或者到国外留学。但现实却没给他这样的机会。

1910年2月，郭沫若前往成都求学。在成都，他见到了原来的小学老师杜绍裳，当时是成都提学使衙门的科长。在杜老师的介绍下，郭沫若考入了四川官立高等分设中学堂作为插班生插入丙班，相当于现在的中学三年级。在丙班，他遇到了后来成为著名音乐家的王光祈和著名作家李劫人等人。他们经常一起谈古论今，切磋学艺，相处得很好。

郭沫若在成都上中学期间，正是辛亥革命准备和爆发的时候。1911年初，成都学界发生了大规模请愿风潮。郭沫若作为丙班代表，参加了组织者召开的各校代表大会。他因拒绝带头复课，遭到学校的开除。后来，由于学校需要他在成都官办法政学堂任教的大哥教本校的法制经济课，才又允许郭沫若复学。在此期间，他目睹了1911年6月发生的四川保路运动，稍后的革命党人领导的武装起义，以及辛亥革命爆

发后四川独立的全过程。在辛亥革命期间，他始终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这一革命斗争的发展。革命的胜利使他欢欣鼓舞，革命的失败又使他痛苦不安。这场革命使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了发展和深化，对现实社会的认识也深入了一步。

1912年初，郭沫若与原配夫人张琼华结婚。这是一个不幸的结合，双方都饱尝了痛苦。双方结合的整个过程，都按照旧的传统方式进行。为了不使父母伤心和烦恼，他勉强应付了所有的结婚礼仪，在婚后第五天便借口学校即将开学，匆匆离家返回成都。

郭沫若回成都后不久，分设中学被裁撤，他和丙班的同学一起转入成都府中学。1913年初，他于此校毕业，考入成都高等学堂理科学习。同年，天津陆军军医学校欲在四川招生，郭沫若便于11月辗转来到天津参加考试。其它科目的考试都挺顺利，唯独作文却使长于此道的郭沫若吃了一个大亏。作文题目是：《拓都与么匿》。郭沫若完全不懂题目的含义，出了考场，才从四川来的一位同学那里知道，“拓都与么匿”，是严复对英语total（全体）和unit（单个）的音译。由于作文考试的失利，郭沫若决定不入军医学校学习，第二天便前往北京，去找正担任着川边经略使尹昌衡的驻京代表的大哥，另觅出路。但由于尹昌衡已被袁世凯软禁，大哥也失去了驻京代表的资格。正当郭沫若绝望之际，大哥的朋友张次瑜准备到日本游历，前来辞行。见此情况，他建议郭沫若与他同去日本留学。在大哥的资助下，郭沫若第二天踏上

去日本的旅途，开始了海外留学的生涯。

二 异国十年

1914年元月中旬，郭沫若一到日本，立即把全部精力都放到投考能得到官费的学校上。当时这种学校只有五所，而且都是每年暑期招生。在这半年期间，他拼命学习日语，补习自然科学。经过半年多的努力，他考入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预科主要是为中国留学生办的，经过一年的日语及基础数理化的补习，然后再分到各高等学校。日本的高等学校，相当中国的高中，但却实行分科制。因此预科也就分为文科、理工科和医科三班。郭沫若来日本留学，是报着学实业以救国的目的，因此文科不在他的选择之内，而在此之前他曾考过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但未考中，显然理工科也不适宜，所以他选择了学医。在一高预备班，郭沫若结识了郁达夫、张资平、钱潮等人。郁达夫学文科，张资平学理工科，钱潮与郭沫若同学医科。四人所学专业各异，但都对文学有极厚的兴趣，所以关系非常亲密，后来又一起组织创造社，并成为其中重要的作家。

郭沫若考入一高预科，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1915年元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以重兵相威胁，强迫中国政府接受。这就激起了国内各阶层人士的强烈反对，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也举行了抗议大会。同年5月4日，日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中日关系

日益恶化。5月7日，郭沫若满怀爱国热情，从日本返回上海，准备同国人一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此时郭沫若虽有救国之志，还未找到正确的救国道路，对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还没有清醒的认识，所以当5月9日，袁世凯不惜出卖民族利益，签字承认“二十一条”时，郭沫若却误认为中日争端已“和平解决”，于11日返回日本继续求学。6月22日，预备班考试完毕，郭沫若名列前茅，被分配到冈山第六高等学校。

1915年9月初，郭沫若来到冈山，进入第六高等学校医科读书。由于用功过度，他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记忆力减退，增加了学习困难。但他深感“国家积弱，振刷须材”，仍然刻苦学习，并取得了良好成绩。日本的高等学校，是大学的预备阶段，十分注重外语的学习。郭沫若所学专业，要学德语、英语、拉丁语等外语，每周的外语课一般都在20节以上。外语教师多是帝国大学毕业的文学士，他们多喜欢用一些外国名著作教材，这样，又使郭沫若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外国文学。在高等学校学习期间，他读了印度诗人泰戈尔、德国诗人海涅和歌德、英国诗人雪莱和大文豪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接触了北欧文学、法国文学和俄国文学，这对他后来的弃医从文有着直接而重要的影响。

1916年暑假，郭沫若来到东京看望住在这里的友人陈龙骧。陈龙骧于这年6月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即而得了肺病，8月就死去了。友人死后，郭沫若来到圣路加医院，为友人取放在这里的一张X光照片。在这里他无意中遇到了安

娜(日本名佐藤富子)。她是仙台人,因热心慈善事业,弃家从仙台来到东京,在圣路加医院做看护妇。她那眉宇间表现出的圣洁的神情,令郭沫若肃然起敬,同时郭沫若那种对友谊的忠诚精神也感动了安娜。她答应把照片找出来寄给郭沫若。友人的后事处理完了,安娜将照片也寄到了,并附上一封用英文写的长信,这使因丧友而痛苦的郭沫若感到极大的安慰与温暖。从此,他们便相认兄妹。

经常往来的信件,穿梭般地织着他们之间的爱慕之情。不久他们便同居结婚,第二年底,便得了第一个儿子和生。这是一个充满了纯洁而高尚的爱的结合。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倍受民族歧视,然而安娜却抛弃民族偏见,甘愿为中国的新生献出一切,甚至不顾家庭的反对,以身相许。这种结合是幸福的,但也给郭沫若带来忧虑和愁苦。因为他们的结合,郭沫若的父母和前妻一点也不知道。当他把与安娜的婚事向家中禀报后,父母特别反对,还一度与他断绝通信,后来念及和生的存在,才算宽恕了他。他也曾几次想写信回家提出与张氏离婚,但又不忍让父母伤心,更害怕把已为旧式婚姻牺牲的张氏逼上死路,所以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

1918年7月,郭沫若从日本第六高等学校毕业,免试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当月下旬,他便带着安娜及半岁多的儿子来到大学所在地福岡。九州帝国大学是日本的名牌大学,医学部在日本更为著名。很多著名的医学专家,如首先发现日本血吸虫寓于钉螺体内的宫田教授曾在这里任教。此外,苏联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

坦都曾应邀来校讲课或讲学。在日本教师中，讲授内科的小野寺直助教授，对中国留学生特别亲切。因为他在德国留学时，曾饱尝了民族歧视之苦，所以决心纠正这种倾向。他经常帮助郭沫若修改听课笔记，做实习诊察，使郭沫若深受感动。郭沫若对他一直怀着深深的敬意。

郭沫若来日本留学，“认真是想学一点医，来作为对于国家社会的切实贡献。”九州帝国大学良好的学习环境，真使郭沫若有如鱼得水的感觉。但由于两个原因的影响，使他在进入大学不久，志趣发生了转变，由立志学医转向渴望学文。第一个原因是他在17岁时，患了严重的肠伤寒，险些丧命。这场大病给他留下一个后遗症：两耳重听。在六高时，因为班上人数少，教室不大，听课未感到困难。进大学后，常常上100多人的大课，全部讲义都是口授笔记。听觉不灵，常使他听不清记不全，也给他临床实习时扣诊、听诊带来困难。第二个也是重要的原因，是此时急剧变化着的中国和世界局势对他的影响。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马列主义在中国得到迅速传播，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以李大钊、陈独秀、鲁迅为代表的革命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阵地，进行着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勇猛斗争。在日本，工人运动也有了进一步发展。由于这两个原因，郭沫若便彻底抛弃了“实业救国”的思想，改变了以往轻视文学的态度，想以文学为武器“鼓动起热情来改革社会”。

1918年8月下旬，郭沫若遇见了分别三年的张资平，二人

商量办一种白话的文学杂志。不久，郭沫若在六高时的好朋友成仿吾因陪着家乡一位老人治眼疾，也来到福冈，同郭沫若住在一起。他也赞成郭沫若他们的想法。但终因人手不够，想法没有付诸实施。1918年暑假，郭沫若想改学文科，但因妻子安娜和朋友的反对，也未能如愿。

这年，日本政府又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渗透。5月，日本政府通过“西原借款”，胁迫段祺瑞政府秘密签定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借此对中国实行全面军事控制。这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在日的中国留学生也举行罢课以示抗议。一部分留日学生还组织了“诛汉奸会”，凡是有日本老婆的人都被认做汉奸，先是警告，要他们立即离婚，否则便诉诸武力。后来，留日学生作出了全体回国的决议，以抗议日本政府对中国的控制。这一切使郭沫若陷于一种非常为难的境地。他和安娜真诚相爱，又有了儿子，不忍和她分离。他虽然也参加了留学生的抗议活动，但却因此受到歧视。同学们纷纷回国了，而他平时一家三口全靠官费维持生活，想加入归国的行列又苦于没有归国的路费。学医难成，从文又不能如愿，满怀爱国热忱无法充分表示，又被人误认为“汉奸”，这一切使郭沫若陷入了极度苦闷之中。

1919年5月4日，中国国内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远在日本的郭沫若虽未直接参加，但“五四”运动掀起的狂涛巨浪却猛烈地激荡着他的心灵，鼓起了他的战斗热情和勇气。他一扫胸中的郁闷，满怀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坚决而勇猛地投身于斗争之中。

6月，他在福冈发起组织了一个爱国团体，参加的人有徐诵明、刘先登、陈中、钱潮、夏禹鼎等。团体取名“夏社”。他们专门搜集日本报刊上侵略中国的言论，译成中文，向国内的学校和报馆投寄，以激起国人的反帝爱国热情。

为了及时了解国内情况，他们订了上海的《时事新报》。该报虽是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的报纸，但它的副刊《学灯》则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以1919年2月开始革新，宣传新思潮，提倡新文化，成为“五四”时期的四大副刊之一。

1919年9月11日，郭沫若首次在《学灯》副刊上发表了《抱和儿在博多湾海浴》和《鹭鸶》两首白话诗，这使他受到很大鼓舞。

同年12月，宗白华担任《学灯》编辑，他是第一个认识郭沫若的诗才及其诗歌创作价值的人。在他的不断催促下，郭沫若的创作热情一发而不可收，许多不朽名篇都是在这时写成的。经宗白华的介绍，郭沫若还结识了当时正在东京留学的青年诗人田汉。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使郭沫若和他的朋友们在文学方面的才华得以极大地发挥。

郭沫若开始在《学灯》副刊上发表新诗，张资平在《学艺》上发表小说，成仿吾也在《学灯》上发表新诗，郁达夫经常向上海的报纸投稿。在时代潮流的推动和现实的启示下，他们都愈加迫切地感到组织同人团体，出版同人杂志的重要和必要，其中主张最积极的便是郭沫若。

随着各项准备工作的积极进行，郭沫若弃医从文的想法

又日益强烈起来。1921年，成仿吾由于友人推荐他做上海泰东图书局的文学主任，便毅然抛弃了已经临近的毕业考试，准备回国就任。郭沫若得知后，当即决定和成仿吾同行，回国在文化方面干一番事业。安娜早已观察到丈夫由于从文不成内心产生的苦闷。她觉得与其让他这样郁闷致病，不如让他回国去另寻出路。所以这次坚决支持他回国，并希望他回国后，有了职业接她们一起去。

1921年4月初，郭沫若和成仿吾一同回到上海。泰东图书局经理赵南公虽表示欢迎，但却迟迟不给他们确定的职务。当初成仿吾回国，是任泰东书局文学主任，但现在文学主任的位置已有人占据。至4月下旬，他们的职务仍未确定，于是成仿吾决定回长沙另寻出路，把组织文学团体，出版文艺杂志的事留给郭沫若办。当时郭沫若已是一位颇有名气的诗人。因此，书局老板虽未给他确定的职务和薪金，但对他十分器重。

这期间，郭沫若一面进行一些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一面联系出版文艺杂志的事情。最后书局老板答应给他们出版文艺刊物。

5月下旬，郭沫若前往日本，打算去东京等处组织稿件，与友人商量编辑杂志事宜。他首先来到福冈，看望了在那里的妻子和孩子。第二天前往京都，会见了郑伯奇、张凤举、穆木天等。接着又到东京会见了郁达夫、田汉等。

1921年6月8日，郭沫若在郁达夫住所会见了张资平、何畏及徐祖正等人，当下大家决定出版的文艺刊物以“创造”为名，暂出季刊。随着“创造季刊”名称的决定，这个创办刊

物的文学团体创造社也正式成立。

7月1日，郭沫若回到上海。这时，泰东书局已经决定停止出版《新晓》杂志，专出《创造》杂志。郭沫若来到书局，一面为刊物的创刊号筹组稿子，一面又在翻译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

郭沫若从3月底回国到他积极主张建立的文艺团体基本形成，大约经历了4个多月。在这期间，他深深地感到，在上海靠文笔养家活口是不可能的，若能继续完成医学专业，一家人的生活倒可以有保障。因此，四个月前他一心想回国从事文化事业，现在又想回到日本继续完成学业了。9月下旬，他将刊物的编务稍作交代后，便回日本继续求学。9月29日，上海《时事新报》登出了《创造季刊》出版预告，预告了此刊物于1922年元旦创刊。

郭沫若回到福冈后，他一面要忙于准备考试和听课，一面要抽空从事译著，另外还要为《创造季刊》写文章，工作非常紧张。在短期内他译完了《少年维特之烦恼》，又在11月以前陆续将刊物所需文章稿件集齐寄交郁达夫。但因郁达夫那篇《茫茫夜》直至次年3月才脱稿，故《创造季刊》的创刊号5月1日才印出来。

1922年7月3日，郭沫若利用假期又回到上海。这时，泰东书局的人员已经增加，原来的住房太狭窄，书局老板便在哈同路民厚南里租了一家一楼一底的房子，让他单独居住。在这里，他又编出了《创造季刊》第二期。9月6日，他返回日本福冈继续求学。1923年3月，他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